

提高理论解释力的两条路径

——侨易学的发展方向

林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关键词〕 侨易学; 理论解释力; 实证研究

〔摘要〕 作为“中层理论”的侨易学, 其价值与意义, 需要在各种领域反复尝试, 甚至进行试错式探索, 方能了解到侨易学的作用与局限究竟在哪里。随着实践的深入, 反过来会推进与完善侨易学理论。而要增强其理论解释力, 侨易学需从以下两条路径着手加以突破: 一是了解自己在理论层次中的位置, 回应其他理论的挑战; 二是在实证部分进行拓展与细化, 使之更具有说服力, 减少可能存在的含糊与自相矛盾之处。而在进行实证分析过程中, 侨易学应当借鉴“新文化史”“微观史”的研究成果, 注重使用平民文本和口述材料, 这样能够让饱含精英文化色彩的侨易学研究更“接地气”, 更具有深入而丰富的理论解释效力。侨易学的研究成果目前绝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 了解理论边界和适用范围, 是现今侨易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中图分类号〕 C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6)06-0018-06

“侨易学”这个学术名词,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研究员近年来力主倡导的新概念。按照叶先生的界定, 所谓“侨易”现象, 指的是在质性文化差异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 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 并且最后完成了侨易主体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侨易学正是为了研究与解释这一现象而产生的理论^[1]。

过去二三年间, 通过叶隽先生的个人努力, 《侨易》一、二辑(第一辑仅仅作了一些理论方面的梳理, 几乎不涉及实证分析)的出版、《江苏师范大学学报》“侨易”专栏一年多以来的持续刊载、《同济大学学报》“德语诗学与文化研究侨易学专题”和《跨文化对话》“作为方法论的侨易学”等栏目的论文发表, 侨易学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曲高和寡式的理论层次, 而是逐渐“下探”, 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利器”。目前的研究成果, 在侨易学理论的关键词梳理、二元类型的划分、个案研究的推进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进展和新的思路产生^[2]。笔者认为, 如何让侨易学这一理论得以发展与完善, 使其

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是接下来应当努力的目标。侨易学欲要增强其理论解释力, 需从以下两条路径着手加以突破: 一是理论的挑战与回应; 二是实证的拓展与细化。

一、作为“中层理论”的侨易学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3], 笔者提出, 侨易学的出现, 可以视为本土学术界开始注重思想自省和理论创新的信号。长久以来, 国内不少学者在研究过程中, 往往采用西方理论与方法, 借用西方先贤或时贤的话语说本土的故事。这种“拿来主义”有可能让学术研究产生“削足适履”的后果, 即为了某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强行地将资料进行修剪, 或者有意无意间对理论进行误读与曲解, 尽可能地弥合双方之间所存在的显著“断层”。而在西方思想理论大举进入中国的状况下, 国内学术界似乎处于“万马齐喑”的失语状态, 缺少足够分量的本土回应。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提倡学术研究的“中国转向”, 以纠正知识与概念的资源方面仅仅在西方的知识理论模

〔收稿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林盼, 男, 上海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子里提供经验论证和理论微调的状况^[4]。

在上述背景下,“侨易学”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富有勇气的尝试。从侨易学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李石曾“侨学”理论的借鉴,还是对《易经》学说的继承,都是对本土历史和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发扬。侨易学由“侨学”引出,“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它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这种观念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由迁移活动中所产生的复杂变化”。而“易学”的加入,则使得侨易学的概念显得厚重。侨易学直指“易”中“交易”含义的重大意义,“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传统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在侨易学领域中产生共鸣,并逐步开始融合,形成了一种时空纵横的图景,用叶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既有空间维度的整合,也有时间维度的演进,如此纵横交错,经纬交织,构成一组有效地理解事物进程的矩阵型结构”,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5],可谓精彩的点睛之语。更值得称许的是,侨易学虽然在思想脉络上承袭中国哲学,但似乎并不只想成为一种仅仅在中国范围内有解释力的理论,而是力求以世界为胸怀,不分畛域,“将世界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作为自身治学的客观对象”^[6],由此可见侨易学的理论雄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少在“器”的构造和整饬方面,侨易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习惯于看到那些“授人以鱼”的研究成果,告诉读者“何为事物的真相”,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授人以渔”,提供一套有说服力的概念与方法,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小一些、浅一些,不必盲目地“拉郎配”或生搬硬套,也能够让后进者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尤可算是惠人之举。

笔者认为,经过最初的理论建构和梳理之后,侨易学目前应当努力的方向是:一,了解自己在理论层次中的位置;二,回应其他理论的挑战;三,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完善理论,使之更具有说服力,减少可能存在的含糊与自相矛盾之处。

在理论层次方面,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认为,理论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级,他提出“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观点,指的是“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而

又必须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命题,既不是完全的抽象理念,又对于具体的经验性命题具有指导价值,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7]。“中层理论”更接近于构成可验证的命题的观察资料,比单纯的检验概括更高一层。

叶隽先生曾提出:“如果仅仅将侨易学作为一种理论,或是哲学来看待,往往有可能陷入浮生空谈。所以有必要特别强调其可操作性问题,甚至是具体的专门研究领域的问题。”^[8]换言之,叶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地给侨易学“定位”,但从他对该理论实际问题作用的期许来看,侨易学的“主战场”应该是在对经验的指导方面。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认为“侨易学”在方法上倾向于实证,实践用理论来丰富,理论用实践来检验^[9]。因此在这种理论谱系之中,侨易学理应划入“中层理论”范畴。换言之,仅仅进行理论梳理或论证,自非侨易学所长,也非侨易学所愿。真正的突破,理应是经验层次的证实或证伪中获得。

笔者认为,虽然叶隽先生的研究背景是外国文学,但他提出“侨易学”概念,似乎并不仅仅想解释各种文学问题,甚至哲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同样是侨易学企图施展的领域。将侨易学局限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领域,未免低估了这一理念的价值,相信叶先生的学术雄心也不止于此。叶先生自言:“对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尝试用‘侨易学’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而在2013年11月的侨易学会议上,胡继华教授提出,应将侨易学的“目标群体”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器物研究,诸如糖、茶叶、酒、烟等的流通和交易;二是制度的研究,如从文化旅行和转型角度对君主制、民主制、学制、法制等进行研究;三是思想意象研究,既非思想,也非意象,而是具有隐喻意味的范畴;四是观念原型研究,包括思想单元、概念历史、关键词等^[10],可见学界同仁对侨易学的前景充满期待。由此也对侨易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作为“中层理论”的侨易学,应当具有“超学科”的解释力,必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应对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挑战,在各种审视的眼光下证明其价值。

二、理论挑战与回应:侨易学的使命

在之前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感到,学科之间的鸿沟显得如此深邃,使得当我们在熟稔的旧有范式中苦心孤诣地寻找可资利用的理论与方法时,往往会发现,或许别的学科正在做或已经做的

努力,已经涵盖或部分涵盖了我们原先的构想,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理论挑战。而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一般来说,人们只能对自己熟悉的资源进行利用,缺少跨学科的视野。人际交往或许难以避免这种状况,但学术研究就应当克服这种“结构洞”现象,主动探出头来,投入各种理论的论争之中。

回到关于侨易学的讨论。如果将理论之外附着的哲学思想剥离,则可以看到,侨易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它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换言之,侨易学注重讨论的是人们在迁移过程中所出现的外在言论和内在心态发生变化的现象,讨论由此产生的转变和新出现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一种“单向度”的讨论,也就是将论述中心完全以迁移者为主体。

但是,对于迁移者的行为或观念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变”或“不变”的问题上。事实上,不同的行为主体所产生的“侨易”效果,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为何有些人“侨易”之后,思想状态会出现鲜明的变化,有些人则没有产生如此效果?换言之,侨易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些人/事/物发生了侨易”,而应该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事/物发生侨易之后,产生的后果各不相同,我们又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政治学等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笔者认为,在人的位移所形成的适应与融入问题上,侨易学就必然受到社会科学关于移民问题的理论和各类实证研究的挑战。有社会学家提出,物理空间的迁移,给移民带来了身份危机和身份焦虑感。通过语言的情境性运用、建立移民社团、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进行诠释,以及移民社会运动等身份磋商策略,移民不断建构新的身份,以获得在异地他乡的生存意义,最终解决“我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11]。这种论述与侨易学的部分概念较为接近。移民研究者认为,移民的个体或群体性行为,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出现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不可一概而论。例如,一些学者注意到,“不同族群实现融入与同化的过程存在着差别,其原有的文化传统、语言、关系网络等都会使得不同的族群在同化的阶段性特征与模式上有所不同”。如社会学家波蒂斯

(A. Portes)和森森布伦纳(J. Sensenbrenner)在讨论移民经济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时发现,有些移民在迁居之后,容易与当地社会产生对抗,而有些移民则不然,其中的机制如何解释?他们认为,“母国和迁入地社会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移民相对于当地人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冲突的广度”,同时,从迁入地社会“撤回”家乡的可能性也影响了移民的行为选择^[12]。沃纳(Warner)与斯罗尔(Srole)总结道,移民实现最终同化的时间长短因移民的文化与种族特点而有所差别。还有一些学者持有移民融入的“多元主义论”,认为少数族群在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在流入地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关系网络。移民进入新的社会环境,并不必然会出现同化的结果,也有可能保留自己原有的族群文化特征^[13]。

为了解释移民群体的不同行为模式,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应当将移民区分为“旅居者”“归附者”和“双重国籍者”三类身份。他认为,“旅居者”抱有临时逗留心态,随时期待返回家乡,拒绝被移入地同化;“归附者”是那些背弃原籍文化,期待被移入地同化的一群人;“双重国籍者”则是“脚踏两条船”,对移出地和移入地都倾注情感忠诚^[14]。社会学家周怡认为,亨廷顿的这种分类方法,深刻地阐释了迁移者对于身份认同的差异化认识,她借用社会学家伯克在微观互动环境与行动个体内在心理的结合理论,强调认同的变动受制于社会环境结构,也是自我确认、自我平衡的结果。一方面个体在社会中被赋予不同的结构位置,位置身份及其身份认同标准的意义;另一方面,个体又将在角色扮演后的他人反应中获得感知,确认“我是谁”的意义。两种意义一致,身份认同较为稳定;如两种意义不一致或具有差异时,认同将发生改变^[15]。

以上关于移民群体相关问题的讨论,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即由于社会环境结构、自我经历及受教育状况等因素的作用,使得迁移者在进行时空位移的过程中,其思想认识必然存在各种差异,绝不能用一种模式加以涵盖,也不能简单地以“变”或“不变”进行概括(“不变”也是“变”的一种,而不是“变”的对立)。归根结底,迁移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状况,应当在进行类型化分析的情况下,讨论导致不同类型出现的各种因素,并进行归纳与总结,寻求概念的升华,这应当是未来侨易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由于政治学、社会学在相关

问题上,都已经作出了不少深入研究,尤其是与移民问题有关的讨论,关注其迁移过程中的心态变化、以及对迁出/迁入地的认知差异,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必然蕴含着不少灵感火花,能够让侨易学在进行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收益。

三、走出“精英主义”的个体研究范式

在实证研究方面,笔者认为,侨易学的价值与意义,正需要在各种领域反复尝试,甚至进行试错式探索,方能了解到侨易学的作用与局限究竟在哪里。随着实践的深入,反过来会推进与完善侨易学理论。既然侨易学的目标是成为既有理论归纳、又有经验指导作用的水准较高的“中层理论”,那么决定侨易学生命力的根本,就是使用者本身的“用户体验”。如果侨易学能够达到以下两点:一,对这一理论的使用,能够解释以往研究过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某些事物或现象;二,侨易学虽然并不一定效力十足,但使用起来方便顺手,区区几招便能直击要害,那么侨易学的“市场前景”必然令人看好。

具体来说,如果将先前在《侨易》集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叶隽本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分类,那么以侨易学为理论先导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侨易”,主要讨论个人进行时空迁移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与行为的迁变状况,如徐显静对伦道夫·斯托、黄少雯对哈尼福夫·库雷西、熊辉对徐志摩、顾钧对费正清所作出的解读等,这一类的研究是目前侨易学实证分析的“重镇”;二是“思”的“侨易”,主要讨论思想理念在进行“旅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如周云龙对“话语”术语的探讨,唐卉对“史诗”词源的考察等;三是“物”的“侨易”,主要讨论物体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历史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产生的“本土性”转变,例如王涛对拱廊、百货商店的研究等,这一类的研究目前成果还较为稀少。

对于目前利用侨易学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我较为同意乔国强先生在2015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对“侨易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侨易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侨易’”,或至少在叶隽看来,“群体性的侨易学分析,不太容易做到”。他表示,假如一个理论主要针对的是

个体,那么这个理论的有用性是有限的,或至少其广延性是狭小的。乔先生进而以侨易学的相关理论,对犹太移民群体进行探讨,对犹太移民到达美国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冲击”,他们在与美国“互动”中所发生的“易变”,以及美国犹太作家的移民经历及其作品,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已经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16]。

当然,叶隽先生从来都没有提过,侨易学理论仅适用于个体,而不能解释群体现象;他也没有说明,侨易学仅能对精英行动进行分析,而不能介入普罗大众的讨论过程。笔者担心的是,目前利用侨易学理论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似乎都是沿着“精英主义”的个体研究路径,即局限在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个人(如上文提到的对伦道夫·斯托、哈尼福夫·库雷西、徐志摩、费正清等人的相关研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历史上遗存下来可供讨论的文本,主要是由精英人物留下的,即使想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进行分析,资料不足的障碍是必然会遇到的。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路径依赖”,即侨易学的首倡者叶隽先生,在其系统提出相关理论的著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主要进行的案例分析即是从精英的个体层次出发(如对魏时珍、王光祈、郭沫若、宗白华等文化名家的讨论),无形中给予使用者某种强烈的暗示。

关于精英的定义,根据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的说法,在人们活动的领域内能力、水平较高的人就是精英,他的界定使用的是“素质—功绩”标准,在特定领域内高素质的人并且取得很高成就的人就是精英^[17]。精英一般掌握着较高的文化资本,且具有将这种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或社会资本的能力。由于精英群体占据着崇隆的社会地位,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利益、地位和态度,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国家政策只反映盛行于精英中的价值观^[18],因此,无论是秉持“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观点,“英雄”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话题中心。但是,如果过于对精英群体进行研究,就会出现忽视精英群体背后起到决定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问题。事实上,平民大众并非只是历史的看客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以自己的力量介入其间,他们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利益,往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因此,在使用侨易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时,应当从精英主义的个体叙事中走出,转向更具平民色彩的群体研究之中。西方史学界近年来的转

向,也证明了这种路径转向的普遍性。“新文化史”、“微观史”研究,开始突破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奉行的“宏大叙事”“精英决定论”等视角方法,将关注焦点集中在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历史,进一步实践了“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主张,“过去曾被史家们所忽略的许多边缘群体也不再失语,他们越来越要求历史书写里要有应有的地位。这些情况促使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不仅包括权力的中心和社会的上层,还更要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西方史学界开始了一场来自下层的史学革命。例如,在西方阅读史的研究上,就是关注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一般老百姓的阅读的研究,而不再将目光聚焦在社会上的精英分子”^[19]。

当然,从精英主义转向平民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材料上的瓶颈。正如巴比耶在《书籍的历史》中所提到的,对西方平民大众的阅读情况进行讨论,“普遍缺乏直接的原始资料(读者不会自我描述),实践上完全缺乏成系列的、可感的原始资料,以提供一个统计学上的真实形式。相反,只好运用那些间接的原始资料构建出习俗及其可能的含义的类型学”^[20]。文艺复兴之后的英法等国家,民众的识字率普遍高于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都面临着资料短缺的问题,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困难。在资料的束缚下,“我们或许未必能够完全精确地建构读者(特别是未曾留下文字记录,因而在历史舞台上‘失语’的贩夫走卒或是妇女等群体)的阅读与思想经历的内在面向的变化”^[21]。

幸而,近年来,不少由平民撰述的文本(日记、信件、笔记、账册、照片、表格等材料)逐步得到发掘整理^[22]。如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保存了数以万计的建国以来普罗大众的私人

书信;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近年来已出版了二十余种当代民间史料集刊。此外,口述史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通过回溯性访谈的方式,从普罗大众那里获得平民视角的材料,以小见大地反映历史命运和时代变迁,这些工作已经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展开。对平民文本和口述材料加以使用,能够让饱含精英文化色彩的侨易学研究更“接地气”,更具有深入而丰富的理论解释效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侨易学的首倡者,叶隽先生理应先士卒,主动采用上述材料,尝试以平民视角、群体视角作为侨易学新的解释对象,以便其他学界同仁、尤其是晚辈后进能够按图索骥,为侨易学的研究注入多元色彩。至于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对平民大众的“侨易”行为进行分析,容易陷入“民粹主义”的窠臼,甚至担心侨易学会成为“十全大补”式的理论,即什么都能解释,又什么也解释不清,笔者认为,这种忧虑大可不必。侨易学的研究成果目前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了解理论边界和适用范围,是现今侨易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笔者记得,当年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国营企业的劳动关系模式提出“新传统主义”概念之时,各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解释力度、理论局限等问题纷争不休。此时,另一位历史社会学研究“大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发起倡议,“捋起袖子,大干一场……把比较政治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真正走进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现场去看一看”^[23]。而这种“捋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精神,正是侨易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能否提高其解释力,进而产生突破的根本。

[参 考 文 献]

- [1][6]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
- [2]董琳璐:《“作为元思维方式的二元三维”研讨会在京举行》,《社科院专刊》,2015年12月4日,第6版。
- [3]林盼:《自省的“利器”:侨易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文汇报读书周报》,2014年10月29日,第9版。
- [4]宁应斌:《中国作为理论:中国派的重新认识中国》,《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 [5]上述内容参见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相关论述。还可参阅叶隽:《在侨易视域中重审人文世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 [7][美]默顿:《论理论社会学》,何凡兴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 [8]叶隽:《侨易学的观念》,《教育学报》,2011年第2期。参见周云龙:《跨文化研究:从“侨易学”学习什么?》,《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 [9]陈建华:《侨易的交易之道——读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书城》,2014年第12期。
- [10]张凤娜:《侨易学:考察物质位移和精神变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9日,第17版。
- [11]覃明兴:《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赵晔琴:《融入与区隔:东北新移民的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 [12][美]波蒂斯、森森布伦纳:《嵌入性和移民:经济行动的社会决定因素》, [美]弗兰克道宾主编:《新经济社会学读本》,左晗、

- 程秀英、沈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276页。
- [13]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 [14][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 [15]周怡:《“家”与“家乡”流动者的乡土情感——“留洋流动”与“农民工流动”的比较》,《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 [16]乔国强:《试谈美国犹太移民与犹太文学中的“侨易”》,《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 [17][美]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6—298页。
- [18]王焱:《民主政治视野下的精英治理:西方精英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页。
- [19]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0页。
- [20][法]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279页。
- [21]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学》,2005年第3期。
- [22]韩钢:《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 [23]李路路、王修晓、苗大雷:《“新传统主义”及其后:“单位制”的视角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Two Ways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Kiao-Iology

LIN P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words: Kiao-Iology;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a "middle theory",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Kiao-Iology needs to be tested repeatedly in various fields, and even in trial and error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limitations of Kiao-Iology. The deepening of practice, in return,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iao-Iology. And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Kiao-Iology, we need to make a breakthrough from the following two ways. The first way is to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know how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other theories. The second is to expand and refine the empirical study of Kiao-Iology and make it more convincing. In the part of empirical analysis, Kiao-Iology should learn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and focus on the use of common text and oral materials, in order to put Kiao-Iology "down to earth" and obtain mor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effect. Nowaday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Kiao-Iology is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through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责任编辑:江奎元]